

文化发生终极原因溯源

——人类学的比较研究述要

何 勇 王海龙

内容提要 该文从人类学独特的视角考察文化发生的终极原因。认为人类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是综合进化的结果,文化和人类的生命本质是一体的,是同步演化,相辅相成的。

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 D·匹尔比姆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得天独厚的,是“无与伦比的一类,人类的成功全在于其文化行为的发展”^①;然而,非常有着悖论意味的同一命题又告诉我们:文化行为的发展是赖于人去创造的。反过来说,没有人也就没有文化,更无从谈及“文化行为的发展”了。因而,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人与文化是同时形成的,这二者从发生学理论上应属于同步、同体共生的。文化是人所专有的,而人又是文化的产物。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行为,它源于历史这个宏大坐标系的哪一个点上?文化和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动物有没有文化?上述问题从人类有了自觉的文化生命意识以来就困扰着古往今来的各类学问家和文化学者。

当然,理论的解释和结论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经过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清理出了一条比较明晰的线索。一般文化学者们认定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除人而外的生物界皆没有“文化”;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首先确定人与动物的不同,抑或人与动物的界限。这个问题在今天乍看起来似乎不是问题,发达的生物学、动物学、比较行为等科学已经明确地回答了它,然而我们在追溯这一问题的原始分类形态时,似乎还缺少一种权威和科学的定论——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还不能够准确地回答猿与人是何时分手,在无限的时空的哪一个具体的限点上猿依然是猿,而其中一支真正变化为“人”。这是一个我们迄今仍未能破译的生命链“断链”现象,这些还有待于以后科学的发展去解决。正是基于此,平空增加了我们对于“人——文化”这一理论命题研究的困难。

① [美]D. 匹尔比姆:《人类的兴起——人类进化概论》,周明镇等译,第 1 页,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由于前述悖论的产生和理论循环现象,学者们对人——文化这一凝固的生命意义的实体不再进行形而上的思辨,而是力图从发生学上去探讨它的具体的、实质性的问题。既然给人——文化本质下定义是那么困难,于是研究者从相反的角度去研究,先廓清什么不是文化。在搞清什么不是文化的同时确立哪些是文化,是人这种特殊的、发达的、独特的、创造文化的动物独自具备的;从而确立文化的所在。在无数学者进行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终于找出了社会集群性、使用工具、仪式活动、运用符号、具备语言这些是真正属人的东西,亦即文化生命本体和形式内容。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对文化命题的研究已渐臻完善。

然而不幸的是,上述“文化”行为是许多动物都具备的,它们不是先天性属人的。很多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者都以大量的事实和研究成果回答了这些问题。

著名人类学家罗杰·M·基辛曾经深刻指出:“一直到六十年代,大部分文化人类学者每当从生物性观点来讨论人类时,都会强调人类与其他生物比较起来是多么特别:我们会使用语言并有积累风俗的能力,因此我们与其他动物迥然有别。经过十五年来反复思考,在动物界中,人类看起来并不那么突出,总的来讲恐怕也并不独特;人类学者已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人类了。”^①他的这段话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首先,以社会集群性而言,这决不是人类的专利。很多动物,甚至尚属生命进化层次很低的生物如昆虫等都具有明显的社会集群性,有些还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等等。美国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曾指出:“……白蚁和猴子,它们都组成占据着领土的合作群体。群体成员之间通过10—100个不合语法规则的信号指令进行有关饥饿、安静、敌意、等级状态或地位、生殖情形等方面的联络。个体对于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别有着强烈的意识,亲族关系在群体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起初正是这种亲族关系扮演了主要的社交活动起因角色。在两种社会中都有标志明显的分工,尽管在昆虫社会中具有更加强烈的生殖成分。”此外,他还指出:“聚集、性活动和领土性是真正的重要性质而且它们被正确地看作是社会行为。鸟群、狼群,以及蝗虫群体是真正的基本社会的良好范例。……在许多生物群体中,从社会性昆虫到灵长类动物,最高级的社会都是直接从家庭单位发展演化而来的。”^②从以上结论看,即使是“社会”这个从广义上也绝不是单单属人的。这种结论为问题的更进一步引伸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其次,就人与动物区别的另一重要特征——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这一点而言,问题也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现代动物行为学和生态学认为,任何一种动物作为种延续下来总对外环境和内在自我调节方面有一种坚强的适应性(或调适性),这种适应性是演化的结果。它进而变成一种内在的生存需要而以种的尺度延续下来,在一些较高的生命生存形式或物种中,这种东西有可能变为文化,甚至可以作为可接受的传统延续下来。因而有些学者就认定这种东西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特别是认为使用工具是人独有的特点。但是人类学家在对大量的人科动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后,终于发现,这种对生存的适用性行为包括工具的使用都不仅仅属人。他们指出:“对猩猩而言,尤其是黑猩猩,工具的使用是适应性行为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促成一个族群有效开发其环境的学习性行为之一。对于野生猿类的研究也发现它们的行为已进入许多原以为仅属于人类的范围。黑猩猩会制造很简单的工具,而工具的使用一定是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学习来的。”“年幼的黑猩猩在很多方面非常依赖母亲,因此可以学到很多事情。人科动物的婴儿有更长的依赖期,可学的东西也

① [美]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第14页,北晨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美]爱·奥·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李昆峰编译本,第8—9页,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就越多。”“黑猩猩漫长的依赖期说明了社会学习重要性。工具的使用成为一种重要的适应方式。……黑猩猩的许多行为都是通过参与社会群体而学习来的。……它们通过模仿、尝试、游戏来学习。黑猩猩幼儿的游戏和人类儿童的游戏极为相似。”本世纪来的实验科学证明,黑猩猩会使用并制造简单工具这一点已是事实^①,尽管这种使用与创造是很简陋的,但毕竟是其萌芽和雏形,人类最早期分化形成时对工具的使用与制造也不过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演变为人而猿终归是猿呢?这个问题现在还难以回答,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工具的使用和制造不是专属人的,也不是人和文化的唯一本质特征,因而它也不能算作人和文化溯源的终极原因。

第三,我们来考察一下仪式活动是不是人一文化与动物行为的本质界限。一些文化学家认为,仪式(巫术)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一切文化形式的最早雏形,仪式化行为是人类特有的,是区别人与动物的分水岭。更有甚者认为仪式就是符号化,就是人化,就是文化。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近年来体质人类学和灵长类行为比较研究的学者又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反证。

文化学者们认为,仪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其目的是促进各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它的本质内容有三:一是它是最早的文化交流手段,如最早的祭礼、图腾活动等;二是在于它的目的主要在其社会功能,是个人需要(need)和社会调节的产物;三是体现在对超自然力量的神秘崇拜上,可分三型——Ⅰ.模仿型;Ⅱ.祭祀型;Ⅲ.生活转折型。

对照上述内容,在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验证。这些例证在灵长类或人科动物行为中最为明显。著名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对这类动物进行过深刻研究,他指出,鼠猴和日本猕猴中都有仪式化的行为来传感它们的“文化”,甚至有其独特的“社会等级”。这种仪式行为主要体现在性和交配问题上,在动物行为中,性—仪式—社会地位等往往是表现一些具体文化内容的。早期的人类也是如此。在上述仪式化行为过程中,性往往失去了它固有的本质和功利性的目的,而成了符号——仪式系统,最后统归到了社会——文化的范畴中去^②。而另一个学者威尔逊也在他的著作中分析了大猩猩中的甲雄在性的炫耀方面的仪式化行为的文化意义,并作了深刻的解释。^③人类学家基辛也就同类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此外,他还论及了黑猩猩的狩猎劳动、分享猎物中的其他仪式化行为。他深刻指出,“有时候这种分享行为会扩展到乞求和集体撕扯尸体的地步,有时候看起来又几乎象是仪式化的行为。这点和其他方面一样,黑猩猩又让我们稍微瞥见人类祖先和我们自己的影子”^④。此外,西方学者珍妮·古多尔在其《黑猩猩在召唤》、萨雷尔·艾默尔等在其所著《灵长类》中都细致地分析了非人类动物仪式的蕴含,这些仪式除了性与社会的意义外,还兼有表达通讯信息、传递情感、下达指令、打招呼、玩游戏、恫吓敌手、欢迎亲族等内容,特别是珍妮·古多尔在她著作中记载黑猩猩神秘恐惧的“雨舞”,这已经和人类的宗教情感、图腾仪式毫无二致了,这是研究人类早期巫术和宗教发源的一种可贵的素材。^⑤

第四,运用符号和语言也并不是人与动物区别的唯一界限。人类学家认为,语言和符号是一个

① Marc J. Swartz/David. k. Jordan,《Culture——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P431—433,John Willy & Sons,New York,1980
[美]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中文节译本,第18—19页,第17页。

② [美]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第39—41页,吕桂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版。

③ [美]爱·奥·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李昆峰编译本,第185—187页。

④ [美]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中文节译本,第18页。

⑤ 见萨雷尔·艾默尔等著《灵长类》及珍妮·古多尔著《黑猩猩在召唤》等。转引自刘骁纯著:《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十分宏观的概念,对它们的界定并不能仅仅用语言学家的定义去解释。语言和符号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仅包括有声的语言、文字、语法系统,甚至也不仅仅包括语音学、语系学和语义学;语言的本质应该和一些生命现象的本质联系起来去考察。即使今天的西方语言学界也承认,用狭义的语言现象是不能囊括语言的意义本身的,更何况,符号更是一种宏观意义的“语言”;尽管符号和信号有质的区别,但符号产生的早期雏形阶段与信号却是有某种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据人类学对人类语言现象的研究,人类语言的最早形式并不是口语;早在人类口语形成之前无数漫长的时间里语言就在形成和利用着了。许多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正确地指出,人类最早使用的语言形式可能是简单的手语,它是和发言者的情绪、动作、姿势、形态等密切有关的。文化学者们指出,这种手语最初形成时期“可能是很严格的模仿性的。”可以想见,这种模仿性直接是从非人的各种高级动物那里继承来的。模仿性、符号语言、姿态语言和手语我们今天仍然可在较近的人科类甚或人类失去口语能力者身上发现,这一点充分地证实了我们的构想。甚至在人类高度发达了的今天,人们为了表达和增强表达的效果,往往仍然借用人类远古时最原始的辅助语态如手势、脸相、语气、神情、姿势等来完成其目的,这些似乎可以看作是人类远古时期文化遗存的一种复活。基于此,我们可以肯定,在人类形成之初,人类确曾有过无声的语言,这时的人类被称为“无言人类”(Homo-mutalalus)。当然,这儿的“无言”是指无声音语言,即无口语。这期的人类至少已从他们的先祖人科类那儿学会了最原始的符号语言和一般的传感交流形式;那末,至少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人类语言和符号系统形成之前,人前(prehuman)的人科动物就已经有了语言和符号的应用能力,在它们那儿,才是“语言”的最早溯源地,尽管这种“语言”的定义已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语言的意义。

众多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非人的动物都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它们无法传达不存在的或想象的东西”,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他的《原始思维》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但动物的“语言”和人类的语言间的这种原始的关系却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美国学者M·基辛指出:“语言最重要的一个性质,就是我们谈论世界上的东西,给它们取名字,我们可以用这些名字来了解和描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依赖具体存在的东西。……人类语言所特有的这种‘设计特征’也可以在动物世界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与其它重大的演化过程一样,非语言和语言之间的鸿沟一定也有一些过渡阶段。”另外,据有关学者介绍:“考古学家推测,大约九百万年以前的古猿已经具有说话的能力。……此外,动物学的研究成果似乎也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现在发现,仅乌鸦的‘语言’就有三百种,而且,鸟的语言甚至还有方言土语之分。总之,人类的语言不是起于现代人阶段,而是在此前很早就开始了。”^①这给予我们很有力的启示:动物语言的成熟性为我们研究人类语言、“文化”的萌芽态提供了比较行为学的系统参照物。

尽管人类的符号、语言和交通行为是向人前动物学习的,但毕竟人成为了人,是万物的灵长,而其他动物在今天仍然是其亿万年前模样,停留在低级的手势语、符号阶段。这里面自然地理、生物等方面的原因和偶然性、非科学的因素是很多的,但从文化飞跃上,人类口语的形成和完善无疑是完成这飞跃的一个有力的文化杠杆。对于这一点,M·基辛曾经指出:“可能到了尼安德塔人时,用嘴说话才伴随着手语符号出现,最后终于取代了手语。口说系统的效率很可能是为什么现代人出现以后会发生这么急骤的演化和文化突破的原因。……口说语言在演化上是很新,而且非常精巧有力的表达概念性的系统。语言使人类得以创造更精致、更复杂的概念性体系,例如逻辑证明和

^① 转引自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第1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数学,但它还是建立在演化更古老的概念性思维的模式之上的。”^①今天,人类的语言能力,人类抽象思维的发达,都与这种有声的语言的产生有重要关系,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文化进程中所创造的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的重要性我们都深知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这一点无论如何重要,它都不能说明符号和语言都是专属人的,是仅为人类所有,抑或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之标志;不幸的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不仅从反面论证了动物(特别是人科类)具有符号和语言,而且充分显示出这一论证的伟大文化意义,甚至人类的符号和语言能力都是动物遗传或向动物“学习”的产物。

鉴于上面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集群性、使用工具、仪式活动,还是运用符号、具备语言等等,这引起都不能算作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单独地考察起来,这些理论都不能成立,因而,人类由来的直接原因和科学考察至今还没有结论。除去许多未知因素和偶然性、非科学性因素外,研究者们本身的思维路线、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局限也是造成这种缺憾的一个原因。由于对人本身形成、来源这一科学命题未能解决,人类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的探讨也难纳入科学的轨道。故而,文化史和文化学研究的目光大多放到了较为成熟的文化形态,把文化发生的上限大大后推了,把精力放到文明程度化较高的文化形态中。我们认为,对一门学科的研究要想把其实质,必须探本逐源地了解其全部过程(不管这种了解要费多少艰辛),才能达到最起码的科学层次。那种肤浅的,泛泛而言的对典型、成熟的文化形式的研究是徒劳无益的,它解决不了上述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必须是溯源而不是截流。

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指出,若单独进行个类考察,“文化的雏形在较高等的灵长类中比在人类中还要多”^②。这一论断是非常深刻的。它提示我们,对人类由来和文化发生的终极原因我们绝不可形而上学地各持一端,而必须综合考察研究。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去偶然性和其他未知的自然因素外,人类的开成和文化的发展是综合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一百九十三种人科猿类动物中,只有那种具有社会集群性、会使用并制造工具、有仪式活动、会运用符号系统并具备语言和学习而且会用意识化行为形式保存传播之的那一种终于进化成为了人。

而且,正是人创造了文化。这大约是文化溯源的终极之点。

我们的结论是:文化和人类的生命本质是一体的。文化与人共生共存,互相刺激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文化赖于人去创造,人的本质和精神赖文化去完善、保留和传播;文化是人类精神的载体,人是文化精神的生命本质。如果没有人,文化便无法创造;如果没有文化,人便将不复为人。文化和人正如鸡和蛋一样是一个正反和的命题。它们是生命的一体,同步演化相生的,无法分而论之。文化是人的产物,而人本身就是文化。

在人和文化产生的最早阶段,人们创造文化是非自觉的。人不是为制造文化而制造文化,而是为生存——活下去的愿望是促使人创造文化、延续文化、传播文化的最伟大的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人求生和向自然斗争中的副产品,它的实质是功利性的。

这种综合考察大约是真正接触和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端倪。尽管人和动物有着那么密切的血肉关系。但是我们在分析人和文化现象时必须把人和动物分开。这样,我们就必须从最根本点上去研究人。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正在于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意识,他指出:“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文化)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人比动物在生理程度化上的完善、在智能上更加聪颖,而主要表

① [美]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中文节译本,第21页。

② [美]爱·奥·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文编译本,第235页。

现在人的自觉意识和社会实践活动方面。在人与动物界根本分歧点的问题上,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了“两种生产”和与之相对应的“两次提升”的论断。他指出,人要真正彻底地脱离动物界,就必须经历两次“提升”。一次是通过“一般生产”即人的劳动“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另一次是通过“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的建立,即社会化的(文化)劳动“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①。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极为正确和深刻的,正是在这关键一点上(Key),他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把上面恩格斯的话再来和马克思的观点对照来看,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判别人和文化的本质。马克思在对审美认识论进行科学评述时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②在这儿,马克思从根本上论述了人与动物本质不同,从而从人的生理、文化上科学地定义了“人”。而恩格斯则把这种生命过程给予了定量性的总结。

马、恩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对人和文化发生的终极原因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和研究,他们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是我们解决文化溯源问题的重要指南。

“我真恨死哈代了!”

在选编哈代书信时,我们发现他于1897年致评论家哈丁奈的信颇有意思。此信的主要内容不外是讲述他的小说问世以来所遭到的种种所谓“正统”观念的非难和攻击:“有些简直不是在评论我的小说,而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在信中哈代尤其提到一些女评论家、女读者对其小说更为反感和不满,批评之词更为尖刻。何以缘故?主要是因为哈代在许多小说中刻划了许多追求自我满足,轻浮放荡的女人,诸如巴斯谢芭、游苔莎、艾拉白拉。她们一般都善于玩弄男人的感情,道德败坏,情欲横流,背信弃义,而且在恶劣的程度上一个比一个更坏。难怪有人说:哈代笔下的女人要比男人坏,但作者对女人的描写要比对男人的描写深刻得多。《无名的裘德》发表后不久,一位女读者发现书中的艾拉白拉被刻划得淋漓尽致,曾气愤地说:“我真恨死哈代了!”

(敏捷)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载《马恩选集》,第3卷,第456—458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恩全集》,第4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